



周天勇：中国潜在和稳定增长 的经济学分析——二元体制经 济学的中国实践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

摘要：基于现有发展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的逻辑方法，对中国这样一个二元体制经济进行解释和分析，可能会有较大的缺陷和不足。中国是一个结构和体制双二元转型的国家，其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元计划体制向二元体制发育释放→二元体制并存胶着→二元体制向一元市场体制并轨”这样一个特长周期的过程。从生产增长看，一元计划向二元市场部分的发育使被计划体制长期禁锢闲置和低利用的要素开始高效率的配置和利用，生产力得以释放，这是 20 世纪后 20 年经济高速增长潜能来源的经济学解释。二元体制并存使要素配置受到计划或行政与市场的双重调节，因此信号扭曲常态性存在；这种体制扭曲可以被经济主体追求利益的行为所纠正，但相当多的扭曲具有不可纠正性；而这种体制扭曲与非扭曲相比，在配置方面造成了“低效率—要素闲置和低利用—体制剩余性要素”及其产出损失，如果不能被不断的市场化改革所纠正，经济增长会处于自然失速的状态；我们可以将竞争性市场经济的一些参照值标准化，用反事实方法计算二元体制各类扭曲值，进而求出体制扭曲差值这一二元体制经济最基本的变量，并用市场机制还原的逻辑，测算改革纠正扭曲形成的新经济增长潜能。其中关键的两个要点：一是因土地基本没有市场化配置，其不可纠正部分造成了大规模的体制性剩余土地，必须建立包含土地要素投入的古典增长模型；二是与完全市场经济国家不一样的是，体制转轨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并不主要来源于广义技术进步，而相当大比例来源于体制改革对要素利用率的提高和对要素配置的改善，并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增长的

历史数据看，TFP 增长是波幅较小和近乎平行的一条曲线。从均衡和安全增长看，人口生育、人口流动、土地交易和住宅供给等体制的扭曲，再加上出口变化，对生产的需求可能性造成了消费迭代收缩、出口竞争成本上升、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居民收入被转移以及消费被挤出的影响；而考虑到全球各国经济从收支有余的保守型模式转向支大于收的债务型模式，特别是中国目前负债率较高并可能持续上升，以及宽松货币政策的必要性，我们探索了包含债务和土地资产变量影响货币供给和价格变动的基础模型。基于这样一个二元经济学的逻辑框架及其分析方法，通过建立模型、模块耦合和编程调参，初步形成计算体系，来模拟各类要素不同部位和力度的体制改革、调水改土发展战略和开放格局的方案安排，以预判其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潜能、需求侧可能性和资产能够保障的债务链和货币币值安全性，为决策提供学理、模拟和不同结果方面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二元体制转轨；扭曲不可纠正；体制性剩余；要素市场化改革；经济增长

引言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随着中国、俄罗斯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陆续从计划调节和大一统公有制经济体制，向市场配置、私有制或者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体制转变，出现了不同的转轨经济学流派。由于中国经济转型的体量较大以及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数量较多，其价值选择、理论基础和实施方案不同，并被区分为“华盛顿共识”[[1]]和“北京共识”[[2]]-[[3]]。从价值取向看，分为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和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市场经济。从改革的经济学方法看，则有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国家调控主义、新制度经济学以及以信息成本、委托代理等学说为理论基础的各流派。而从体制转轨实践看，则有瞬时型转轨与渐进型转轨、先后改革与平行改革、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等不同的方案、操作和过程[[4]]。从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转轨看，俄罗斯和东欧各国向着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进行了瞬时转轨，效果各异；中国向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与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渐进式转轨，至 2020 年已经取得了年均经济增长 9.2%、人均 GDP 达到 10500 美元水平和经济总量上升到全球第二位的成就。与大多数东欧国家 5 年左右、10 年以内从一元计划经济转向一元市场经济[[5]]不一样的是，中国经济渐进型体制改革迄今已经四十余年还没有结束，很可能贯穿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起 GDP 翻两番，到 2035 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20000 美元发展水平和初步实现现代化的一个特长周期。也就是说，中国二元经济体制转轨，是一个长周期中存在的常态性格局。其规模之大、时间之久、转轨之复杂、影响之深远等，需要作为专门的对象加以研究，用二元体制经济学来解释和揭示其转轨过程、内在联系、客观规律和变化趋势。

“十四五”规划提出了 2035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远景发展目标。[①]中等发达水平的人均 GDP 在 20000—30000 美元之间，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前提下，未来 15 年 GDP 平均增长速度要保持在 4.73% 的水平上。为了从改革寻求经济的活力和动力，相关的规划和措施也部署了深化改革的一些重大任务。

推进改革和体制转轨并不是为了转轨而转轨，根本目的还是为了通过形成市场配置资源的体制，解决二元体制下的效率低下和浪费严重等问题，谋求国民经济的高效、稳定和中高速增长。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在分析渐进式转轨中（特别是转轨时间很长）国家改革与增长的关系时，方法逻辑与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不完全适用的问题。虽然也有一些文献测算推进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潜能之间的数量关系，但似乎还没有建立起一个能用于分析中国渐进式改革的逻辑框架体系。

学术界在这方面基础理论研究的滞后，给中国复杂的改革实践带来困扰，使得在改革重要性及紧迫性、重点改革部位和改革带来新经济增长潜

能估算等方面无据可依。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内在分析陷于比较和定性的猜测。Lawrence 和 Zheng[[6]]对改革前和改革后产出和增长进行了比较，发现改革往往带来新增的产出。但这是黑箱式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前后数量比较，分析不了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动能的内生关系和结构组合。这样的研究无法为政府制定改革方案提供较为科学和清晰的依据。二是新古典增长模型本身并没有表达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间的逻辑关系。由于其既定的条件就是市场经济场景，特别是认为全要素生产率（TFP）来源于广义的技术进步，使得一些学者的研究在分析范式与政策含义之间、投入产出分析与改革建议之间不存在内在的逻辑性。这容易误导政策研究者、方案制定者和行动决策者，即从新古典增长方法的分析看，经济增长的重点在于教育深化、知识进展、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新技术产业化，改革对于经济增长似乎无关紧要，在模型中没有改革提高效率的逻辑位置。三是土地要素不包含在经济增长模型中，使其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经济增长潜能无法在方法上体现出来。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解释，一般一国可利用的土地数量固定不变，并且农业耕地即使增加，其增加值在总产出中的比重持续下降，边际产出越来越低；暗含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土地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已经资产化和市场化了。因而新古典经济学在增长模型中将土地要素舍弃了。然而，由于中国大规模土地还没有资产化、国土利用率水平还较低、土地还将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和非农业、体制性剩余土地潜能还要改革再投入来获得等特殊性质，只有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投入的增长模型用于分析其经济增长时，显然存在重大缺

陷。

生产能力的实现，需要有需求容纳的可能性边界。2012 年中国劳动力开始迭代式收缩，延续下去，会对就业—收入—消费产生传导和动态趋势性影响；虽然出口需求占 GDP 比例下降被经济房地产化逐步替代，但其土地财政和高房价对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形成了转移和挤出，使中国经济增长消费需求不足和供需失衡。这有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转型、人口再生产影响延后和房地体制扭曲的特殊性。

向发达国家发展水平迈进，币值的稳定是一个重要的前提。中国从一个奉行以收定支和略有结余观念的社会，也转向了支大于收和负债攀升的赤字财政、企业负债和家庭负债投资及超前消费的时代。目前负债货币与 GDP 的比例已经很高。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债务质量不高和未来养老金缺口大，意味着国民经济的负债率还会上升，货币发行也会越来越多。如何保证中国债务和货币体系的安全，实现理想和稳定的增长，也是学理和改革上需要讨论的内容。

本文将围绕中国上述转轨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研究，在学理基础方面做一些逻辑梳理、方法完善和量化分析等方面的工作，形成能够解释改革的经济增长奇迹，以及能够运用和服务于未来改革推动经济可能中高速增长实践的分析方法和逻辑框架。

2. 要素配置改革先后顺序和二元体制转轨的历史逻辑

从学理讲，中国渐进改革的历史逻辑与要素改革的顺序逻辑大体上是一致的。从经济体制转轨的动态过程看，中国迄今为止走了长达四十余年二元经济体制渐进转轨的道路，并且其有这样两条逻辑脉络。

2.1 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先后顺序

从产品、要素和资产市场化改革的先后顺序逻辑看，最早进行的是为计划生产产品向为市场生产商品转变；再是要素配置体制改革，其中最先无偿拨付资金向借贷资本化启动，接着劳动力市场化配置改革推进，最后土地要素全面市场化配置改革探索和启动；而城乡资源、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性等土地如何推进资产化改革，正处在讨论、研究、论证阶段。

这里，我们重点讨论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顺序逻辑。从各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启动先后、规模演变、体系进化逻辑看，先是进行了资金有偿使用的市场化改革，再是推进了劳动力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转变，最后才触及到土地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攻坚。

最早开始的是资本要素的市场化改革。1979年以前，国有企业流动资金和固定资产投资来源是财政拨款。从1990年起，先实行利润留成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4589

